

逆鱗集续编

——
历史科学的使命

薛国中 著

逆鳞集续编



——历史科学的使命

薛国中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逆鳞集续编: 历史科学的使命 / 薛国中著.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10
ISBN 978-7-5192-1943-7

I. ①逆… II. ①薛… III. ①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5221 号

著 者: 薛国中

责任编辑: 赵鹏丽 包晓婧

装帧设计: 黑白熊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6 千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目 录

历史科学的使命

1

儒家在中国政治史中的地位

49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

73

榷铁制度的解体

——宋代矿业中经营方式与所有权之变迁

93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补农书》与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变化

133 115

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成败

——对十五至十七世纪中国历史的再认识

149

黑死病前后的欧洲

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欧东扩论

191 167

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成长的关系

——十八世纪荷英中三国历史进程的考察

美洲白银与欧洲价格革命再议

245 225

论三国荆州之争

诸葛亮与《隆中对》

281 263

编后简言

297

历史科学的使命

历史科学的使命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历史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使命在于揭示历史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去，但其意义却在于现在和未来。历史科学通过研究过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社会状况，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历史科学的使命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解释过去，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

历史科学的使命首先体现在对过去的记录上。历史科学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历史资料，构建起人类历史的脉络。这些资料包括文献、实物、口述等多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历史科学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深入研究，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这种记录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延续。历史科学的使命在于确保人类的历史不会被遗忘，从而为后人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其次，历史科学的使命在于解释过去。历史科学不仅仅满足于记录事实，更致力于探究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历史科学通过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如文献分析、考古学、社会学等，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解释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并从中提炼出普遍性的规律。历史科学的使命在于通过解释过去，为人类提供智慧和启示，从而指导未来的行动。

最后，历史科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历史科学通过对过去的研究，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的社会建设和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历史科学通过揭示历史的规律，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持。历史科学的使命在于通过研究过去，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注）本文参考了《历史科学的使命》一书，该书由历史学家撰写，详细探讨了历史科学的使命和价值。此外，还参考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以确保本文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引 论

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重视自己的历史，珍藏有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如中国有会要、会典、实录、经世文编、个人文集或笔记，等等）和历史文物，有自己的历史著作陈述自己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圣贤精英们的丰功伟业，弘扬本国灿烂的文化和彰显本民族的尊严。

中国是世界上珍藏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多种体裁的“通史”和叙述某个朝代、某段时期的“断代史”以及分裂时期（如汉末三国、晋后之南北朝、南宋与辽金西夏，等等）的“国别史”，有分门别类的各种“专题史”，还有记述地区史事、山水、物产以及风土人情的“方志”，等等。这里有应该回答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史学是什么？如此浩瀚的历史著作，其意义何在？后汉许慎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①他把史学只看成记述历史事实的这种解释过于简单，没有道出史学的本质和意义。或谓史学是撰述本民族国家演化进程，使人们认知本国历史的状况，以其光辉灿烂的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进民族自尊心。不错，确有这样的意义，但这绝对不是历史科学内涵的全部和最本质的方面。

历史学确实是记述人类过去生活的种种事件和各类人物，可以说是

^① [汉]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5页。

已经消失的社会的社会学。它自身就是一门学科，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自身就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重要的综合性科学，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如同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一样。历史科学是以史事（史事的文字记录和历史文物）为基础。史事的真实性是它的灵魂，也是它的科学性之所在。可以说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因此史料的收集、梳理、考证成为史学的基础工作。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成绩斐然，出现了许多大师；但因此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产生了一种观念：非考证不能称为史学。如果对史学仅做这样的理解，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再者，著述历史即或未因政治和社会的需要而虚拟、隐讳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也不屈服于权威压力，敢于中正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然而对史实不加分析，不做价值判断，也未臻于历史科学的要求，并没有超越汉代许慎对史学的认识的界定。

明末清初，王夫之明确地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繇也，则恶用史为？”^①他从“经世致用”及“以史为鉴”的理念出发，把历史视为治国理政，服务于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生活指南，以及作为展望未来的参数，体现其社会价值。对历史学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合乎史学科学性的要求，但还只局限于社会自身的范畴，还需做进一步深广的认识。

史学作为一门重要科学，它的使命是什么？两千多年前中国史学宗师汉代司马迁在其致好友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的《报任安书》中，以其广视天下、解析宇宙与人类关系的洞察力，高瞻远瞩，申述他以《春秋》直笔所著《史记》的用意是：“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②

① [清]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5页。

② [汉] 班固：《汉书》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用现代语言解读为：对历史的认识及著述历史的目的，是从以往人类在自然界如何生存、发展的事实之中，确定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梳理和通晓两者自古及今历史演变的脉络，在此基础上对以往客观存在的社会做深切的认识、了解和理解，明白其原因和结果，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作为人类生存、生活不可或缺的借鉴，进而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展望未来的前景。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宏大而深远的眼光，令人叹服不已。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一家之言”，对史学而言，具有“开天辟地”的深远意义，是人类历史科学的指南，是史学研究的纲领，也是历史科学的使命。然而纵观古今，后世学者们对此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实在令人不解。一个民族若是不能正确认识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不能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正确认知自己的历史，它就是个对现实浑浑噩噩、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民族，将会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

究天人之际（一）：天人一体

自然界（整个宇宙）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中国自古以来把自然界称为“天地”，“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幼学琼林》）。就现代科学发展水平而言，“天”（宇宙）是广大无垠、无始无终、包罗万象、能量无穷、变化有序的浑然整体，至今任何顶级科学家都不敢断定宇宙有无边界，其运动有无始终，其能量有无枯竭之虞，这一切只能是无休止的发现；“地”是人类生存之所，栖息之处。人类只是天地中的一个小小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自然界中，人属于生物中的动物类，按照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人类处于进化阶梯上最高的位置。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他们具有最发达的思维能力，即智力，或称“理性”“意识”，可以说是“天之骄子”。

中国经典古籍《尚书·泰誓上》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①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称人是“‘大自然’最精美的艺术品”^②。宇宙间是否还有比地球上的人类更高级的生命体，迄今尚不得而知，有待科学进步的新发现。

人类与大自然之间是母子关系。皇天后土，大自然是人类的父母，生我养我育我。没有大自然，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包括生活资料的求取、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类自身的繁衍。人类受大自然哺养。从原始以渔猎为生，经中世纪的农耕畜牧，再到近现代机器生产的大工业、信息产业，大自然供给了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的一切条件，从衣食住行的各种物质到阳光、温度、空气、土壤、雨水、能源以及各种各样的元素，等等，无一不是大自然慷慨给予，真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就是靠大自然所提供的这些元素而成长的。因为人类具有比其他动物高级发达的思维能力，所以与大自然的关系从被动的依赖，变为有意识的主动索取。大自然的赐予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而逐渐改变。人类的认识愈深广，受赐愈丰富，并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改变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步。这一切是其他动物不可能做到的，它们始终停留在对大自然依赖的水平。当自然界发生变化后，有些动物不能适应，遭至灭亡。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③“类存在”意即人类整体的存在，或者说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存在。

无论是大自然（天地）向人类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的一切，或是人类主动向大自然索取，都使人们把天人一体错误地看成是天人各为一

① [唐]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 11，《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180 页。

② [英] 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引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1 页。

③ [德]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6 页。

体。西汉时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与”概念，导致人们错误地从根本上把人类与自然界分别开来，对立起来，非常荒唐，而后代学者袭其说。唯北宋理学家程颢正确地认识到：“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①更有甚者，把人与自然相对抗，提出“人定胜天”“改天换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等等，好像大自然是由人类主宰、听人支配的，这种观念完全违反自然规律，其结果是“与天斗其祸无穷”。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告诫道：“人类愚昧地以为自己是自然界的主宰，然而，实际上我们无法主宰任何事情。”^②恩格斯也曾经告诫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③现代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也指出：“凡有生命的东西都不能将自己看作是脱离宇宙的存在——更不能将自己看作是一种反宇宙的存在。”^④正确对待大自然，热爱大自然，是人类为生存和发展的天职。

自然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运动自有不随人意而改变的规律。人们只能循其规律，在其规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对自然进行有限度、有次序的开发、索取、利用和“改造”，而不能改变其本质和运动规律。人类的活动本来就是自然界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必须与大自然的运动规律保持一致性，不可越轨，必须坚持大自然固有的“生态平衡”，这是一个钢铁般的永恒原则，否则毫无疑问会遭到自然界的警告，甚至严厉的惩罚。不幸的是，人类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有意或无意地在实际生活进程中违反“生态平衡”的原则，对自然界过度的开发，无限的索取，与大自然的运动规律逆向而为，从而造成种种自然灾害的发生。这样的

① [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语录》二上，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② [法]伏尔泰：《哲学辞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③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9页。

④ [日]池田大作、[英]汤因比著，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第150页。

情形，历史上屡见不鲜，迄今犹然。突出的例证是 11 至 14 世纪中叶的欧洲因人口成倍增加，原耕地所产食物不足以供养。他们不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能力，而是大力毁林开荒，填湖造田，扩大耕地，从而使适应人类生存的植被和湿地的面积大大减少，打破了生态平衡，其后果是：14 世纪头二十年内气候异常，粮食无收，饿殍遍野，导致 1347—1351 年发生了空前恐怖的瘟疫，即“黑死病”，肆虐于西欧、南欧、中欧和北欧。这些横遭瘟疫的地区，总人口损失了 1/3，严重者达 1/2，最严重者达 2/3。薄伽丘（1313—1375）的小说《十日谈·第一天》中描写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那时的悲惨情状。西方学者对这次大流行的瘟疫议论纷纷，说它“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是一条鸿沟，把欧洲经济分为两个长的时期”，等等（详见本书《黑死病前后的欧洲》一文）。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一次严厉教训，甚至改变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航程轨迹。类似这样的情况，亦屡见于中国的史籍。明万历年间徐光启批评说：“与水争地，贪尺寸之利，而遂遗无穷之害矣。”^①可谓金玉之声。中国长江三峡大坝的修建，是顺应还是违反自然规律？在当前是利是弊？对子孙后代是福是祸？自始迄今一直争议不休。专家们早有定论。知情者担忧不已，它如同一把利剑，高悬在人们心上。后果如何，常人只能是等待历史得出结论。生态环境状况如何，关系到人类身体的康病，甚至危及生命；也关系到社会发展的速缓、民族的强弱、国家的兴亡。自古及今，历史上所发生的“自然灾害”，不排除其中许多是人类破坏生态平衡所造成的后果。特别是近现代生活中废气、污水的排放，雾霾的笼罩，气候变暖等，正在对人类身体造成巨大的损伤，诱发种种疾病迅速流行，危及整个生物圈生命的安全。因此，无论是大自然的赐予还是人类向大自然的索取，人类对自然的首要责任就是要珍惜、保护，努力保持大自然的生

① [明] 徐光启著，石声汉点校：《农政全书校注》卷 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18 页。

态平衡，任何破坏大自然生态平衡的行为都是有害的。这也是历史科学应承担的使命——“究天人之际”，揭示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历史事实，以无数次的历史教训，使人们正确认识天人关系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现今世界各国相继重视环保事业，把环保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自1995至2015年，联合国共召开了21届气候变化大会。2015年第21届大会，参加者190余国，确定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2016年4月22日，175个国家在联合国签署了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今后全球各国都按《巴黎协定》的精神对待自然界，这是理所当然和划时代的头等大事，人类之大幸，否则人类将会像恐龙一样从地球上灭绝，此非骇人听闻之言。

如今人类既然明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并决心正确对待自然，克制对自然的无限贪欲，提倡绿色生产和生活，这是一大进步。有人说1760—1840年的“蒸汽时代”是第一次产业革命，1840—1950年的“电气时代”是第二次产业革命，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信息时代”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现代强调环保是第四次产业革命，俗称“绿色革命”。这是很恰当的，但还应当指出，前三次“革命”只是优化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而第四次的“革命”——绿色革命，则关系人类生命的康健和长寿，意义更为重大。

究天人之际（二）：人性与社会

“人性”即人的天赋秉性，“凡性者，天之就也”^①，其与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类本属于动物，是从一般动物中分化出来的。人类与其他动物具有共同的本性，称之为“兽性”，或称“自然性”，这是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注意的问题。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

^① 章诗同：《荀子简注·性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9页。

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①恩格斯所谓的“人性”就是“社会性”。“兽性”与“人性”是相互矛盾的，此消彼长，或彼消此长，人世间的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诚实与欺诈、正义与奸险、贪腐与清廉、和谐与斗争、战争与和平，等等，均由此而生。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等等，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归根结底都是人类自身“人性”与“兽性”斗争的体现。因此，从“人性”的角度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兽性”与“人性”相互斗争和彼此消长的历史。亚里士多德认为：

“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掺入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②马克思甚至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专制主义者，其统治完全是兽性在政治上的表现。他在致卢格的信中严厉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③兽性的本质特征是：每个人为了自我和家族、族群的生存、繁衍、享乐，甚至荣誉，损人利己，不顾一切地攫取己之所需的一切物质，以至于不惜破坏自然物体、改变自然面貌、污染生态环境和损伤其他生物的生命，这些都是“性恶”的显露。

关于“人性”问题，中外学者自古以来就有争论，大致是四派：性善论、无善恶论、善恶兼有论、性恶论。中国战国时期，孟子（约前372—前289）是性善论者，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具体而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④孟子认为仁义理智信

① [德] 恩格斯：《反杜林论》，[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页。

②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③ [德]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4页。

④ 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9页。

这些道德就是从人性之善产生的。他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①所谓“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具有的。与孟子同时的告子（姓名不详）则认为“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流）无分于东西也”^②，是无善恶论的代表人物。日本现代学者池田大作则属于善恶兼有论，认为“人的本性既非善，也非恶，而是两者兼而有之”^③。与孟子同师子思（孔子之孙孔伋）的荀子（约前313—前238）则是性恶派，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孟子所言“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④。他认为：“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意即教化）人之情性而导之者也。”^⑤荀子认为人之所以性恶、伪善，是由于“人生而有欲”^⑥“生而有好利焉”^⑦。“有欲”“好利”，一切为己，是潜意识的欲望，是人的本性。儒家并不否定人的自私性，孔子早在关于私有制“小康”社会的论述中就指出，人们都是“货力为己”“以功为己”，为其私利，“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是起”^⑧，不惜用暴力（战争）取得自己的利益，所以他提倡“仁爱”。荀子则主张以“法度”抑制人性之恶，从而成为法家的鼻祖。后世儒家多从孟子之说，特别是南宋朱熹将“仁义礼智信”进一步发展为“天理”。清初黄宗羲解释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⑨，这类似于17、18世纪西方思想家们所谓的“自然法”。荀子的

① 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9页。

② 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4页。

③ [日]池田大作、[英]汤因比著，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第385页。

④ 章诗同：《荀子简注·性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9、258、264页。

⑤ 章诗同：《荀子简注·性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8—259页。

⑥ 章诗同：《荀子简注·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3页。

⑦ 章诗同：《荀子简注·性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8页。

⑧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414页。

⑨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5页。

观点与近两千年后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人性论相同，二人穿越时空同声相应。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就是人性理论。他认为人天生自私，各自为己，这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欲望”，是“自然赋予了每个人在所有东西和事务上的权利”^①。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 汤因比也说：“人类本来是贪欲的存在，因为贪欲性是生命特质的一部分。”^②贪欲既然是人类的本性（其他动物亦是如此），是人生存的需求，没有欲望也就没有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天然合理的一面，不可一概否定。为了生存而心怀贪欲，促使人类不断地认识客观环境，开发自然所赋予的一切，以满足人类充裕、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科学的发展，应该说这也是“天理”。但是应有限度：一，不能违反和破坏自然环境及其规律；第二，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的利益，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当首先是“己之所欲，无损于人”，这是人际关系的底线，也是国际关系的底线；三，要以仁爱为本，不可为一己、一群体、一民族、一国家之私利，强凌弱，众暴寡，相互攻伐，彼此残杀。越过这三个限度，就成为不合理的人欲，就是性恶的根源。让恶性无节制地发展下去，以至于战争；而特别是现今军事科学发展到极端残酷的时代，人们为了私利而进行的相互攻伐的恐怖战争，造成难以想象的悲惨结局，无人幸免，后果只能是整个人类自取灭亡。

荀子与霍布斯都只是强调人性不合理的一面，这成为他们政治理论的基础。霍布斯认为，人类因为具有“理性”而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一，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往往不能自我限制，“不是在一顷间享受

① [英] 霍布斯著，应星、冯克利译：《论公民·论不存在公民社会时人的状态》，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

② [日] 池田大作、[英] 汤因比著，苟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一次就完了，而是要永远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路”^①；二，每个人为一己之欲，不顾他人利益，“极力要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②；三，不是只顾眼前的利益，还要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未来的生活着想。这三点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由此可见，人的私欲比动物强烈得多，最具有无限贪婪性、掠夺性，最狡诈、最凶猛、最危险^③。于是便彼此侵夺，“就自然状态而言，所有人都有害人的意愿”，“他为害的意志起于他为其财产和自由与他人争斗的需要”。“人天性的贪恋的危险每天都在威胁着所有人”，从而使得人人产生“相互的恐惧”心理。“相互的恐惧就会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寻求联盟。”^④应该说人类之所以寻求联盟，不仅由于相互恐惧，也不仅来自他们自我相互斗争，更是来自自然界强势动物的侵袭。如果人类彼此之间不断进行残酷争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民族、国家终会导致两败俱伤，其结果只能是削弱人类自己抗拒外来威胁的力量。客观形势促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以调整人际关系、自我约束、和谐相处，或以其他力量进行强制，把整个人类联合成永远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于是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向心力”“凝聚力”，形成整体力量，以抗拒外来的威胁和共同有效地获取生活资料，这就是社会的形成。社会是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人类生存、生活与发展的基地，是人际关系的总和。汤因比说：“人类如果不生活在社会环境里就没有可能变成人。”^⑤而霍布斯所谓“大规模的、持久的社会的起源，不在于人们相互的仁慈，而在于相互的恐惧”^⑥，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片面的。人类组成社会之后，就产生了

① [英] 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2页。

② [英] 霍布斯著，应星、冯克利译：《论公民·献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③ [英] 列奥·施特劳著，申彤译：《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④ [英] 霍布斯著，应星、冯克利译：《论公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10页。

⑤ [英] 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⑥ [英] 霍布斯著，应星、冯克利译：《论公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人的“社会性”即“人性”。

应该明确的是，“人性论”不同于“阶级论”，不能用阶级性代替人性。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生的，未来也会到一定时期消亡。把人的一切言行阶级化，扭曲人类天赋秉性，混淆“社会性”与“自然性”区别，是绝对的荒唐。

人类进入社会之后，其原始的“自然性”即“兽性”并没有消失，而是如恩格斯所说，其与人性相比较只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进入社会的人类内部相互之间仍存在各种矛盾，如抢占栖息地，抢夺生活资源的斗争，甚至进行相互厮杀的战争，种种不和谐的事情不断发生，成为社会的“离心力”“扩散力”。为了维系社会的存在，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不至于解体，人际关系需要协调，社会有必要产生管理机构即国家政府，这个国家政府必须以道德为准绳。道德是人际关系和谐相处与善于对待自然的契约，国家执政者必须维护这个契约，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德政”之首在于“仁民而爱物”^①，就是说政府对人民以及人民相互之间要存有仁爱之心，对自然要保护；为此，有必要建立法律制度作为德政的辅助。这些都是其他动物所不能做到的。应该说这也是“理性”的一面。不过这种“理性”不是天赋，而是在生活实践中产生的。

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道德与法律是相辅相成的。法律治体，道德治心，缺一不可。法律具有威力，能强力制止任何人不能为恶，不敢为恶；道德是人的内心修养，使人认知不应为恶，不愿为恶。二者是共同维护人类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友爱的利器。孔子云：“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暂时免于为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自我纠正错误。《方言》卷三：‘格，正也。’）。”^②

^① 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2页。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页。